

# 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里

姜玉卉

1963年我初中毕业考入通县师范。本应1966年毕业，因“文革”运动推迟到1967年11月份才分配工作，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教师。满以为学有所成，半个衣锦还乡，应冠以光荣的人民教师的称谓。相反，头上扣了个“臭老九”的帽子，成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。教师是教育者，怎么会变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？这缘于“文革”非常时期，具体说是缘于1968年一条最高新指示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指示下达不久，全国大中小城市，在校的初高中学生，分批分期上山下乡，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同时，将农村中、小学教师也列为教育对象，还戴个“臭老九”的帽子。“臭老九”怎么来的？有两个因素。一是历史上，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，教师排行第九等始于元代。元代将人的等级排为：官、吏、僧、道、医、工、匠、娼、儒、丐。知识分子排行第九等，在娼妓之后，乞丐之前。倒数第二。二是“文革”时期，将批斗的对象排序为：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叛、特、走、知。知识分子也是第九等，倒数第一，九前边还加上个“臭”字，叫“臭老九”。

首先，感情上难以接受，思想上很困惑，想不通，我能考出大山，到城市读书，当时在农村我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。在城市里读了几年书，又回到家乡，把所学的知识为山区的为人民服务，怎么就成了“臭老九”，不受人爱戴了呢？走在大街上抬不起头，脸面灰溜溜的。

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是中央精神，谁敢不执行？谁能左右的了呢？很快贫下中农代表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中、小学校，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。学校原领导班子要接受贫下中农代表的领导和监督。贫下中农代表不懂教学，用管理

生产队的模式管理学校。学校教学有他自身的规律，完全不同于生产队。有的贫下中农代表受极左思潮的影响，在师生面前摆革命造反派的架子，指手画脚。说光学好数理化不行。会变成修正主义者，修正主义把师生用火车拉到苏联去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于是。学校每周都要安排忆苦思甜活动，将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农大爷大妈请到学校向师生忆苦思甜。以班级或小组的形式走出学校，到村里访贫问苦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凡遇上公社、学校所在的村子有大型批斗会，学校师生停课，参加批斗会，充人数，喊口号，造声势。说是政治任务，比上文化课重要。七十年代初，山区的核桃树患虫灾，本应农村技术员、县农技站共同研究如何靠科学方法防治。没见到科学防治的措施，却让师生放假三天，拿着盆盆罐罐抓虫。那么大面积的虫灾，虽然师生捉了成吨的虫子，用石灰水毒死，但解决不了大问题。第二年，仍然虫灾继续。一次县级领导要召开植树现场会。为了造声势，充人数，让师生停课半天，带上劳动工具，打着校旗、彩旗到离学校6里地的山坡上参加现场会，师生和社员劳动了半天，到中午时分，县级领导也没有来，师生没有带中午饭，事前只说去半天，中午回来，下午继续上课。结果，师生又累又饿，学生坚持不住，喊着回家吃饭，让老师很是为难，左劝右哄，到下午2点多县级领导才到，现场会结束后，师生饿的得直不起腰来，还要走6里地回学校，至今那场景记忆犹新。

我是党员，出身贫农，担任学校负责人，政治上没有污点，还是有胆量跟贫下中农管学代表理论。我强调学校有自身的工作特点，与生产队不同，我们的任务是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。管学代表反驳我说，你没看报纸上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吗？光有知识，不参加劳动，就不能反修防修。我听了哭笑不得。

在那个特殊年代，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自己的看法，但不能公开抵制，反对。只能是被动的去接受。又一想，贫下中农没有错。管学代表也没有错，他们是在执行上级精

神，都是可悲之人。自己抱定一个宗旨，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事，把我学到的文化知识能为山区人民服务，心里都高兴，苦也乐意去做。当时交通不便，出入都是安步当车。每月发薪水回家一次，其他三个周末去生产队参加劳动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为了表示自己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打成一片，早晨吃完饭。要带中午饭。我从食堂买两个馒头，然后到村中亲戚家把馒头留下，换两个玉米面窝头，中午在地头和社员一起吃窝头就咸菜，显着和谐，不特殊。那个年代，小麦面粉在农村是稀少的，北京市农民每月国家只供应半斤面粉，还要等春节一次发给，为的是让农民过个好年，吃顿白面饺子。余下的白面，平常来客人或做碗面片汤给生病的人吃。除此之外饭桌上见不到白面。谁都知道白面馒头比玉米面窝头好吃。那为什么要用馒头换窝头，不是脑子进水了，而是年代特殊，人思想上的扭曲。我现在回想起来可笑，本来朴实的人都变成虚伪了。写到这儿，不得不让我想起一件事。学校领导组织公社全体教师听一个报告。报告者是我的师弟，在另一个公社办“抗大式”的学校。校址在高山山上，带领师生开荒种地，住半地下的土窝窝。当时，走“抗大”的办学道路是新生事物，是践行教育革命。学校领导不认识报告者，让我去车站接他，只见他浑身尘土，衣服好像一个月没洗，头上的军便帽汗渍、油泥脏兮兮的，帽舌头成不等号。蓝色军便装右肩有一个三角口子，走起路来，三角布片一扇一扇的，如一个黑色的蝴蝶。脸像个把月没洗，耳朵眼里存着泥土，脚穿一双黑色条绒松紧鞋。两个大脚趾从鞋帮窟窿里探出来。我见到他的形象，不禁暗笑，忙问一句：“师弟，怎不换换鞋，洗洗脸？”他骄傲，满不在乎地说“保持本色吗！”现在回想起来，极左思潮将人的意识和行为都扭曲了，不堪回首。

我当时有一个坚定的行为准则，既然自己是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，就要少说话，尤其在领导、贫下中农面前，不要像在学生面前那样以师者身份教育人。要少说，多听、多干。把学到的知识、才干为群众服务。除了前面提到的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之外，还帮助村中办批判专栏，利用墙报

宣传中央精神。我能用一支笔，写出漂亮的仿宋体、黑体大字，至今。很多老房墙面还存留我写的大字标语。在公社技术员的指导下，我和老师在东班各庄村，搞12个小麦品种优劣对比。从种到收都由我们完成，写出文字资料。在张中兴的指导下，班各庄中学建立了5406菌种基地，供周边几个村子做5406菌肥的种苗。为此，化学老师郝素珍和我牺牲了很多暇日，到生产队去指导。从5406菌肥生产，到用菌肥浸种、施底肥等多种环节试验、实施，倾注了大量心血。这些活动，当成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
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，农村教育基本上是无序状态，没有纳入正轨。极左思潮，突出空泛的政治严重干扰文化课的学习。文化课从时间上就得不到保证。除每年的寒暑假外，公社党政领导与公社文教组干部一商量，学校就可以随便放假。学生回家，教师到村中与社员同劳动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如春播假、麦收假。这三个假必有。有的村没有麦田，也放假，叫夏锄假。还有临时需要也放假，东班各庄公社在陈家坟村外河修胜天水库，水库大坝在雨季前要浇筑完工，工地劳力不够，公社干部有办法，让中小学生在放假，教师是最廉价的劳动力。我们86位教师背着铺盖，带着钱粮，大干13天，眼看钢筋水泥坝，在河谷间竖起来。那24小时三班轮换可把教师累得不亦乐乎，回家休息几天缓不过来。记得劳动结束那天的总结会上，公社领导表彰了教师，说我们经受住了贫下中农的考验，比社员干的还棒。最后说，教师平常劳动一天补助三两粮，这次给四两。当时听了领导的表扬，13天劳动多奖励了13两粮票，虽然身体劳累，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

为了更有力地落实教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工作。公社在三个村建立了基地。设想让公社范围内的中小学教师轮流离校半年，到基地参加生产队劳动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当20几位教师半年劳动结束时，第二期没法办下去了。因为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要上小学、初中。学校生源急速攀升，教师紧缺，参加劳动的教师回校，师资也不够。只能

从农村中的高、初中毕业生择优来做代课老师，才勉强解决师资问题。“文革”运动中期，学校各派组织进行大联合，成立“革命委员会”简称“革委会”。1969年“九大”后恢复党团组织。学校有党支部、团支部、革委会、贫下中农管学代表，不知谁说了算，之间的关系很微妙。我是新发展的党员，兼团总支支部书记和革委会委员。除了贫下中农管学代表的会我不参加，其他三个机构的会我都要参与。一次党支部和革委会都同意每天晚八点的政治学习改成周二、四学习，周一、三、五晚上备课。并让炊事员王师傅（学校雇的临时工）不用参加政治学习。晚上早休息，第二天早起给老师做饭。管学代表不同意，说是用业务压、冲击政治学习。不让王师傅参加政治学习，是剥夺贫下中农政治学习的权利。看不起王师傅没文化等等，一项项大帽子扣下来，在那种政治高压下谁也犯不上争辩。最苦的是不住校的老师，有的带手电筒每天晚上八点来校学习。这种形式的政治学习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。我当时二十多岁，正是青春勃发的年纪，边教学边学习的阶段。多少知识渴求去探索、积累。多少先贤的教学经验要我去学习、检验总结。然而，每晚几十位老师聚集在一起听我读两报一刊（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、《红旗》）的文章，学马列著作，《共产党宣言》《法兰西内战》，毛主席的老五篇（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、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）等等。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，也必然会产生意外的政治笑话。一天晚上政治学习，我读了20分钟《法兰西内战》，觉得乏味。当时，我正对毛主席的词《念奴娇·昆仑》感兴趣。会背了，还想体会词的韵味。于是，停下来让大家讨论，说说体会。几个老师发言后，管学代表说，别竟听老师发言，也让咱们的贫下中农说说，意思是让王师傅发言。王师傅在鞋底磕了磕烟锅里的烟灰，把烟袋放在桌上，很严肃地说，刚才听姜老师念的书里，那个巴黎公社，搞得不怎么样，分值还8厘，比我们北峪村还低。老师们听了后不禁大笑起来。王师傅见大家笑，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问大家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出了笑话。

当时，我们几位同学在一起讨论，都感到生不逢时，“臭老九”的帽子戴着，搞对象都难，六、七十年代的姑娘对象的标准是国家干部，军人，工人，医生，售货员，一提教师免谈。甚至同窗学友女生，也不愿意嫁教师。一是政治地位低。二是工资也低。然而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历史也会开玩笑。一次学友聚会。几位女同学搞的对象是军人，复员后当了煤矿工人，初中毕业现在都是半文盲，退休金二、三千元。可能心态上有些不平衡，竟和我们男生说，当初你们怎么不给我们写封情书？我们听了啼笑皆非，惊叹时代会使人的思想意识扭曲，事态炎凉多么可怕、可悲！

1977年，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，1985年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，教师如鲤鱼打挺儿，翻了身，尊师重教又成了社会的风尚。贫下中农管学代表退出了校园，也不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事了，教师也成了香饽饽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的公民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，只是分工不同而已，但目标都是为了富国民强。城乡结合，脑体结合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确。因极左思潮，人为地将脑体对立，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极大损失。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。